

江西师大历史学文库·海外研究江西译丛

梁洪生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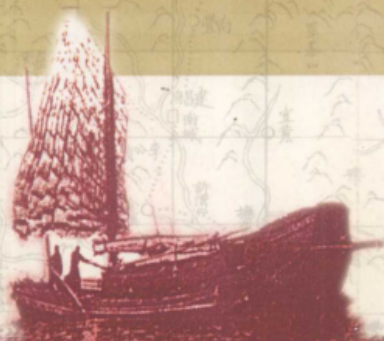
江西

江西教育出版社

地方贸易与税收

KIANGSI NATIVE TRADE AND ITS TAXATION

(1850-1920)



[英] 斯坦利·福勒·莱特
杨 勇 译



KIANGSI NATIVE TRADE AND ITS TAXATION

责任编辑 洪晓梅 装帧设计 张 延



ISBN 7-5392-4084-9



9 787539 240848 >

ISBN 7-5392-4084-9/K·56

定价:16.00 元

江西师大历史学文库

海外研究江西译丛

梁洪生 主编

杨勇书送
06.2.13

江西

[英] 斯坦利·福勒·莱特
杨 勇 译

地方贸易与税收

JIANGXI DIFANGMAOYI YU SHUISHOU

(1850-1920)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地方贸易与税收(1850-1920)/[英]

斯坦利·福勒·莱特著;杨勇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12

(海外研究江西译丛/梁洪生主编)

ISBN 7-5392-4084-9

I. 江… II. ①斯…②杨… III. ①商业史—江西省—(1850-1920)②地方税收—经济史—江西省—(1850-1920) IV. ①F729.5②F8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683 号

江西地方贸易与税收(1850-1920)

[英]斯坦利·福勒·莱特著

杨勇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抚河北路 40 号 330008)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2-4084-9/K·56 定价:16.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译丛总序

江西遭遇世界

在确定用“海外研究江西译丛”来表达这套书的内涵时,我知道可能引起误解:一些读者会以为海外学者的这些著述是“专门”研究江西的。其实不然。这些学者研究的对象和空间是“江西”,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的确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面貌和地方特色,但并不具有异于“中国”的特质。所以,他们关心的“江西”主要是一个“说事儿”的案例,一个做实验的空间,而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是想考察“中国”发生了什么,怎么样了,为什么,等等。如果套用一句现成的话,那就是“从江西看中国,从中国看江西”。这是一种考察角度,是一种思维模式,还是一种学术训练和学术传承的结果。这也是一些国内同仁不熟悉、不习惯的,因为以往的通史模式和学术训练教给我们的是另外一套东西。以自己的经历来说,要进行这种考察角度和思维模式的转换,需要时间,要多读别人的书,还要有实实在在的研究作为演练,往往还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但这种转变的确需要,值得。

近年来,对翻译海外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所造成的影响有不少比喻,譬如说是又一次“洋务运动”,而且是别无选择的;又说是“第三次鸦片战争”,以比喻正在破除“宗教是鸦片”的陈说,等等。那么,对于这套“译丛”的立意和目标能给出一种说明和预期吗?我想,也许用“第三只眼睛看江西”这句话还算合适。这是江西籍著名作家胡平先生对我的一次访谈话题,是想在近代社会大变局的背景下,跳出江西看江西,看看别人如何界定和评说江西。只是这里的“别人”换成了“海外”,换成了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

筹划这样一套“译丛”,还因为自己有一种感受和用心:这么多年来,江西的学子们可以看到的“译丛”、“文库”、“书系”已有不少,且颇

多名著,但产生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读进去的有限。这其中当有多种原因,但想来这些书都在说别处,说大地方,说“显学”,读起来难免有隔膜感,恐怕也是原因之一。那么译来一些说本地事、讲身边人的著作,也许比较容易产生亲近感,并能够提供一些深入研究和比较的案例和解释。这样,由关注具体的“事”到思考背后的“理”,由一域而扩大到更大的空间,或许有更多的本地读者可以从中受益,进而有可能培养出理论思考的兴趣来。

这篇类似于总序的文字,本来是用“江西与世界的对话”为题的,成文之后,先寄给一些在外省高校工作或读书的朋友听取意见。一位以直言著称的优秀学者,也是我的大学同学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见解:“江西还没有对话!”斟酌再三,觉得他言而有据。他是从江西走出去的学子,对这块土地知根知底,而且返观者必有其不同的视角。的确,我们这些年来还只是迎面碰见了外来人,往往语塞,或是茫茫然不知对方为何等角色,为何来此。换言之,是一个外部世界向江西走来,二者相遇了,江西“被卷入”了世界。从以往的学术传统和积累,从现今的学术队伍总量和构成,从应对外部影响和挑战的心理准备和技术能量等等方面来看,江西在整体上还是缺乏对话能力。因而我改写了题目,也更强化了我的一种意愿,那就是做这样一套“译丛”,不仅仅是把书译过来出版而已,而且还要从学术史上加以回溯。应该把自己放进去,梳理出一条从过去走到今天,由“渐知”到“渐行”的轨迹,看看起初我们是如何了解到一个外部世界对江西的研究,后来又是怎样开始和这些研究者们进行交流切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的历程,现在就不可能有这套“译丛”的问世。风动旗动心不动,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等于不存在。

—

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号召之一是全国编修新方志,得到与会学者的积极响应。次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各省编修地方志的工作由此而逐步展开。就各地方

高校而言,虽然不是编修方志的主要部门,但展开系统的地方史研究,无疑与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江西师大历史系的地方史教研室就成立于1980年,这在当时的江西高校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从事地方史教研的机构。此后,组建队伍,开设课程,汇编资料,研究专题,一做就是十多年。到1991年,获得“中国地方史”硕士授予权,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第六个被批准的“中国地方史”硕士点。同年年底,研究室主任许怀林教授独撰的《江西史稿》完成,洋洋五十余万言,是其十余年来对江西历史关注和解释的集大成之作,一个阶段的研究脉络和视角也由此得以反映。

在此期间,透过阅读中文的历史专业学刊了解外部世界的动态,是江西这一类地区学者的主要途径。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上一篇对自己影响很大的文章,即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一文(黄当时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副教授,Modern China的总编)。文章开篇说明:“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三十年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时研究者寥寥无几,现在已达千人以上,研究重点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截止1977年,英语世界,主要是美国,出版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共986种。”除了数量的统计外,更重要的是黄宗智将三十年来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代人,并就其代表作加以简介。由此我们知道,第一代的领袖人物是哈佛的费正清,突出的学者有耶鲁大学的玛丽·赖特·勒文森以及哈佛的许华茨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从中国移植美国的史学研究,它是由中国血统的学者组成的”。黄随之提到了萧公权、何炳棣、张仲礼、瞿同祖四人的研究重点和代表作,并作如下评述:“以上四位先生都源于解放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他们在美国经过多年的耕耘才获得了那些研究成果。他们的著作引用了大量资料,并且结合了比较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或概念,是今天的研究生必读的基础书。这些著作作为第二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打下了基础。”黄继而将斯坦福的施坚雅、哈佛的珀金斯、库恩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并以

“结合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来界定这一批学者的特点。但很明显,对于被黄宗智称为“第三代青年学者”的介绍,是该文的重点,五分之三的篇幅给了这批“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并坦言 *Modern China* 季刊从 1975 年创刊以来,“主要代表第三代学术中的一些新趋势”。黄将这一批学者的研究重点定义“酝酿中的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他们和前辈学者的区别和发展在于:“从第一代的官方史,到第二代的结合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社会史,到第三代的综合性的地方史,这个过程的主要学术内容是史学和各部门社会科学的结合。因现代的社会科学而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使历史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多面化。这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的主要过程。”如果说我们由此而得知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韩素瑞(Susan Naguin)等人的著作,并在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看见它们,那么黄氏所述这一代学者开始“对哈佛学派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的批评”,实际上已经在向中国大陆学者介绍美国史学界对“美国中心观”的扭转。但有些中国学者后来在陈述这一转变的学术史时,对黄宗智该文所作的推介似乎未给以足够的尊重,甚至可以明显看出有从黄文移植过来的影子也是如此。而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地方院校的读者而言,黄文始终是一棵常青树,有长时间的引导作用,而且越是到后来,越发令人感到其信息量大,概括全面,理论穿透力强。我也是在黄氏此文,得知他本人和两名研究生合作撰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中央苏区时期》,于 1978 年出版。黄还提到他本人主要利用陈诚“石叻文库”和毛泽东《兴国调查》等资料,来“考察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区、乡、村三级基层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该书至今没有中译本问世,但推测其论及的地域空间应该主要在赣南及闽西一带。

1983 年底,《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艾恺(Guy S. Alitto)教授的《当前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地方史的趋势》一文。文尾注明原文用中文写成,但“发表时内容有所删节”。大陆的读者应当是在 1991 至 1993 年间,才看到他的两部名著《最后的儒家——梁漱

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并在两书的“中文版序”和“代序”中，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作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艾恺的文章不长，在对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介绍和评介方面，总的来说没有溢出上述黄宗智一文的框架，也用了“第一代”、“第二代”的划分。又以“年轻的一代”来概括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写文章的人群，并说明“最近四五年来，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日渐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中国地方史方面，许多研究生也选择地方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该文的特色和贡献是在不长的正文之后，“为使中国学者详细了解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地方史的状况，特将研究者姓名、通讯处、研究题目表列如下，希望这些资料能对中美学术交流产生促进作用”。于是，我们一共看到48位学者的著述及其所在国家，其中37人来自美国，3人来自澳大利亚，2人来自加拿大，2人来自荷兰，另各有1人分别来自英国、德国、挪威和日本。据此，我们至少知道有3位学者的研究直接以江西为题，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博士席尔（Sheel Kamal）的《一九二五年江西三县的反抗运动》，芝加哥大学依州大学列福士（Edward W. Caves）的《赣南的地方经济史》，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林振华（William Wei）的《国民党在江西的活动》。另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芬却（John H. Fincher）的《广东诏安县及福建、江西和广东附近地区》，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社会学中心本顿（Gregar Benton）的《长征后抗日前东南的中共游击区》二文，应该也含有江西的内容。

无论是黄宗智还是艾恺，都在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及农民运动，“农民学”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所以在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活动及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研究总是不容回避，加上5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资料汇编可供参考，因而可以常做常新。循着这一线索，我们在以后的长时间里，逐渐对这个研究系列增加了更多的了解，知道至少还有金一苏（Ilpyong Kim）：《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3），《政治

江西地方贸易与税收(1850-1920)

动员和经济榨取:在江西时期的中共土地政策》(1979);塞缪尔·Y·库珀(Samuel Y. Kupper):《中国的革命:江西省,1905-1913》(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彼得·W·多诺万(Peter W. Donovan):《江西的红军,1931-1934》(康奈尔东亚论文,第4期,1976);斯蒂芬·C·艾芙瑞(Steven C. Averill):《高地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在江西的兴起》(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82),《江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社会和地方精英》(1987),《地方精英和江西山区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的地方精英和控制模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编辑),《行动中的新生活:国民党在赣南,1934-1937》(1979年宣读);爱德华·雷夫斯(Edward Laves):《农业社会与现代化革命: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兴起》(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论文,1980);詹姆斯·波雷克(James M. Polachek):《江西苏维埃时期的道德经济(1928-1934)》(《亚洲研究杂志》1983年,42卷);德里克·沃勒(Derek J. Waller):《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和1931-1934年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1973);埃伦·贾德(Alan Judd):《江西苏区的革命戏剧和歌曲》(剑桥大学,发表于Modern China,1983.9);林振华:《德国顾问在镇压中央苏区中的作用:神话与现实》(1981),《国民党在江西围剿中的军阀主义与派系主义》(1983),《法律与秩序:苏维埃时期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在围剿共产党根据地中的作用》,《中国的反革命: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国民党》(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5),《以少胜多的起义:对共产党在中国江西取胜之生态环境的再思考》(1994)等等。

在以上列举的著述之外,还难免遗漏,但是相比而言,英语世界对中央苏区和国共两党在江西活动的研究,还是多于对江西其他历史专题的研究。这种状态,似乎在80年代江西学人对英语世界研究动态的了解方面也表现出来。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上,有江西学者撰写的《近年来江西地方史研究概述》,对英语世界的研究动态未着一字。而在江西出版的《党史文苑》1990年第1期上,则有黄平所撰《国外关于二战时期江西党史研究情况简述》一文,从史料汇编、人物传记与回忆、专题研究三个方面加以介绍,其中用较大篇幅提到

黄宗智本人的三篇文章，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至1934年兴国县的实例》、《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和《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的分析：革命者与西方学术界的对抗》。还提到黄宗智在1978年发表的《评关于江西时期的几部西方著作》一文，“对西方研究二战时期江西党史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五本书进行了分析评价”。在该文列出的著述名目中，除了上述金一苏、沃勒·德瑞克二文外，还有约翰·鲁的《处于反对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1966），香蒂·斯沃普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66），勒德菲特的《1931-1934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在人民政府中的经历》（1973）。据后来了解，黄平主要是参照了北大张注洪教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一书的相关论述，写成这一部分，但对国外研究动态的重视和借鉴由此而表现出来，其问题关注也明显超出狭隘的地方史视角。所以，他引用了黄宗智以下一段论述作为自己文章的结尾：“只有把领导层的斗争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懂得中国革命，懂得中国革命是在江西时期开始形成的一场巨大的社会运动。”

我本人最近见到的一个研究者实例，是西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汤若杰（Roger R. Thompson），1990年7月，他曾到过江西寻乌县考察，并将毛泽东《寻乌调查》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2003年11月底，因为寻乌县政府积极的邀请和资助，使汤若杰先生几乎以闪电速度拿到签证，偕妻子来寻乌县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学术研讨会”。此前我已确知英译本《寻乌调查》（Report from Xunwu）在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但一个新的情况是在我和他深谈后才知道，即在美、英有一些大学历史系把英译本《寻乌调查》作为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必读书及原始资料。他还给我看了厚厚一叠美国大学生的作业为例证，例如一篇读书报告即论述《如何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去分析中国社会》（How Perceptiv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is Mao Zedong's "Report from Xunwu"?），由此可知他们是认真的，而且对那些还未能来中国作实地考察的外国大学生来说，不失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革命的途径之一

——即使是细读过《寻乌调查》全文的中国人,谁又能不赞叹毛泽东对农村和县城生活调查之细,了解之深呢——汤若杰在《寻乌调查》英译本“导言”中已经作了如下提示:“尽管确实可以证明我们把这篇文章当作研究如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商业、农业和教育等领域的资料来源是正确的,但最好还是要记得把它看作一部政治文献,一部在革命中产生的文献”。换言之,把“历史的文献”放回到“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把“革命的文献”放到“革命的过程中”去理解。因而,不仅要关注《寻乌调查》的写作,还要关注作为寻乌本地革命者的古柏是怎样帮助了这些调查的进行,还要关注《寻乌调查》手稿后来长时间的“遗失”及其在1982年的正式出版,以及该文在论证邓小平重新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之正确方面所起的作用等,这些都是汤若杰“导言”一再提及并尽力加以解读的地方。现在,江西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刘慧已完成这篇“导言”的翻译工作,将有助于人们对国外学者研究《寻乌调查》现状的了解,而且更会启发我们去思考以往忽略了甚至从未想过应该讨论的问题。然而,由于种种的现实原因,至少上述英文著述的绝大多数至今仍未译成中文,甚或是译成了中文而不能在以中文为母语的地方出版。但我们明确地知道它们在英语世界的后续研究中反复被征引和讨论,而大多数国内学人还因为无法看到或看懂其原著而难以展开对话,令人甚感遗憾。对此,我们已在努力,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中文译本作为曾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立及其逐步消解的双重例证,呈献到读者的面前。

二

在人文学科的对外开放方面,江西与政治文化中心及沿海地区的差距在80年代已经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人人言及的江西“三无”——无重点大学、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至少说明就其高校的状态而言,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言资格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以及由此而处于的边缘状态。而这十年的差距,向前追溯,与50年代“院系调整”造成的惨重后果不无密切关系;向后延伸,则使一批江西

学人长时间地感到这份遗产实在沉重。到 90 年代初期,直面与“下海”热潮形成强烈反差的学术萧条,江西高校一批年近不惑的人文工作者出现了一次大分化,相当一批“孔雀东南飞”,令人扼腕!而在这次人生抉择中再一次倾向学术的人群,自此也就沉下心来,义无反顾地为以后的生存发展做长久计了。可庆幸的是,江西师大作为江西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大学,还是有老的学术传统,不仅古籍藏量居全省高校之首,而且对社会科学类书刊的订阅收藏也有多年的积累,甚至文、史系科的图书资料室都藏书可观,不乏精品。这些书刊给读者提供信息的过程常常是:先从一批发黄的学刊中发现民国时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译文,启发你不得不去关注 20 世纪前期以来的学者队伍构成及其学术如何传承;而 70 年代末以后作为“目录索引”或“汇编”出版的各类工具书,则可使人了解此前二十多年间无法与外部世界直接对话时,别人对我们的研究进展。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外环境十分不理想的时候,只要你还想做学问,在这块院墙内照样有小楼可成一统,后生学子还可以看到一批老者倔强忙碌的身影,并逐渐以他们为精神引路人和同志。这样,以后的十余年里,除了对上述英美学者研究赣南闽西根据地革命运动的动态着意了解外,我们的关注还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到“经济”到逐渐靠近“社会”的变化过程。

从有关“目录索引”或“回顾”资料看,50 年代到 70 年代“海外”关注江西的另一支队伍在日本,时段则主要锁定在宋代。长期以来,宋史在日本都是热门的研究,宋代的理学研究是一个传统课题。明治维新以来,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支那哲学”派是研究理学的主要力量。自从内藤湖南 1910 年《概括的唐宋史观》一文发表,主张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唐宋这一变化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引起日本学者关注。其中,基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巩固之上形成的宋代“文官政府”,及其对宋代君主集权制的积极作用,是最具结构性的重大课题。因而对于五代到宋初南方的地方豪强家族得势,各地士子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江西这样一个两宋科举特别兴盛、人文蔚起的地区就显得分外耀眼。已知的研究至少有青山定雄的《五代

和宋代的新兴江西官僚》(《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年出版)、《宋代江西出身的高官的婚姻关系》(《圣女女子大学论丛》,1967年第29期)、《宋代华南官僚系谱——重点论述长江流域的官僚》(分三部分发表于1974年和1977年),吉冈义信的《北宋初期官场的南人官僚——对王钦若和丁若的研究》(《铃峰女子短期大学研究集报》,1955年第2期),清水茂的《北宋与晏殊和欧阳修等名人有姻戚关系的人》(《东洋史研究》,1960年20卷3期),东一夫的《王安石的万言书和地方政治》(《东京艺术大学研究报告》17集10分册,1966年)等。这一关注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如森田宪司研究的《宋元时代的修谱》(《东洋史研究》,1979年第3期),认为对江西各家族谱牒的研究会涉及到对族谱有浓厚兴趣的地方理学家集团。东一夫《王安石的学统》一文提到,王安石的学统同《宋元学案》中的安定、庐陵二学案有密切关系(《多贺论集》,1983年)。柳田节子则有《文谢之死》一文,专门研究了文天祥和谢枋得二人的死(《响沫集》,1987年)。小林义广多年集中研究欧阳修,1999年有《欧阳修的后半生与宗族》一文(东海大学文学部《纪要》70),分析了欧阳修重视血缘关系,编撰族谱以维系宗族精神团结的行为,从中领会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意识。1986年7月,江西省历史学会为纪念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编印了《王安石研究文辑》,其中专有“日本王安石研究论文著作选目”,一共辑录了27篇论文的题目及出处,虽然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论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王安石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和理解。

坦率地说,我们至今还难以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这些研究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可以感觉到日本学界对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明显受到了唐以前“豪族共同体”论和明清“乡绅”论的影响,并且在对个人或家庭、家族的研究方面,已经透出对“地域社会”的深刻关注。例如我们至少还看到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江西宜春的李渠(809-1871)与乡绅》的研究(《东洋史研究》1977年36卷3期,并于1995年1月在海南“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上宣读),该研究关注两点:通过考察这条存在于唐、宋、元、明、清五朝的水渠,看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都市(袁州)及

其近郊的供水设施；考察乡绅在李渠的维护和运营中所起的作用。作者看到的情况是：自晚唐到北宋期间，李渠的管理由渠长一人担当；从南宋宝庆三年（1227）以后，李渠的日常管理由城内的“甲户”和近郊的“陂户”共同承担，具体事务由城内的乡绅负责，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斯波义信将这种水利运营形态视为“一种早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由乡绅领导下的城市参事会”。2001年1月以后，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在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看到他对李渠的详细研究和进一步申论。此外，1987年发表的伊藤宏明《唐末五代时期江西地域的地方势力》一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末政府在江西的管理秩序崩坏之后，钟传、危全讽、彭玕、卢光稠及谭全播等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过程，并且把土著居民的族属问题也一并加以讨论，且始终把这种变化当作“唐宋变革”的具体案例来考察。

在此，还有一位韩国学者吴金成教授对江西明清社会的研究必须提到，并以之说明他与日本学界的渊源关系。1995年8月，吴教授第一次到江西，与师大地方史教教室的几位老师见面。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晤谈：吴教授懂汉文而不会说中国话，同来的祥明女子大学史学科金钟博教授则会说中国话而不认识汉文，而我们是既不懂韩文又不会说韩语。这样，无论是说过来还是说过去，都要以金教授为中介；而一旦要看史料，则又要吴先用韩语解释给金听他才能懂。吴教授供职于国立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当时还担任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据他本人1993年发表的《近十年来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文回顾，韩国的“东洋史学会”创立于1965年，次年开始出版韩文的《东洋史学研究》期刊，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其所谓“中国近现代史”包括明清史在内。1969年汉城大学将史学系一分为三，建立了韩国第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的“东洋史学系”。吴金成是在日本读的博士，最早的中国史研究论文发表于1964年，其后十年间的系列论文集中在明末清初士大夫及教育、科举等问题。第一篇研究江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见于1984年，题为《海瑞新论——明末江西南部的社会和他的治绩》。此

后,他又发表了《明代鄱阳湖周边农村的社会变动》(1985)、《明代鄱阳湖周边的水利开发与绅士》(1985)、《明代扬子江中游三省地域的社会变化和绅士》(1986)、《明代江西农村的社会变化和绅士》(1989)、《明末清初江西南部社会与绅士——清朝权力的地方侵透过程与关联》(1990)、《清朝权力的地方侵透过程——以明末清初江西南部地方为中心》(1991)、《明清时期在湖广的江西商人》(1999)等文。2001年8月,吴教授来大陆参加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又赠送了四篇新作:《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与都市社会——以景德镇及周边地域为例》(1999)、《明清时代的社会变化与山区都市的命运——以江西河口镇为中心》(2000)、《明清时代河口镇居民的存在样态》(2001)、《明清时代工商业市镇的发展与商人——以景德镇、河口镇为中心》(2001)。如果我们还知道吴教授多年来还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无赖”团伙,那么可以明显看出他从过去对农村社会、乡绅作用的关注转向对明清江西市镇及其居民生存形态、商人集团的研究。而且从地域范围看,他拓展了对明清时期作为“长江中游之谷仓地区”的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比较研究。故他山之石,我们不仅大可借取,还应先以之为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逐渐注意到民国时期日本来华人员在江西的调查。最早的中文资料,见诸师大图书馆所藏民国四年(1915)《地学杂志》第六年第二、七、八、九期连载的日本理学士野田势次郎在江西的实地考察报告。《地学杂志》系张相文1910年创办于北平,1927年以前一般每年出版10到12期。在第六年第二期上,发表《述野田氏大庾岭之调查报告》,译者为林壬。开篇有按语说明:“日本理学士野田势次郎所著湘桂山地及资水流域之调查报告,曩既经节译载本杂志矣,兹又获其大庾岭旅行之调查报告及湘水流域之调查报告二篇。此类文告,殊非寻常游记之比,堪为振兴实业研究地学之资,爰更译述,赓续载之。”从文中可知野田氏由广东东莞、惠州、河源、连平一路北上,进入江西的龙南、信丰、赣州、南康、南安(今大余县),再入广东南雄,终抵韶关。前后47天,行程“三千五百七十里”。野田文字所述分为“区域”、“地形”、“气候及交通”、“地质”、“物产”、“地方”、“泉币风俗

等”各节,尤其是“地质”一节又细分为“水成岩”、“火成岩”两大类,在“水成岩”类之下又分成“古生层”、“赫色砂岩层”、“冲积层”三小类,文字叙述非常专业,据此推测野田势次郎可能是地理学科出身。另外又如“地方”一节,对所到各县的河流、城墙、城区规模及居民概数皆作简要记载。再如“泉币”一节对各地使用的货币,尤其是地方小币种之混乱与使用不便等有所记述,史料价值甚高。此后在《地学杂志》第六年第七、八合期及第九期上,又分别刊载了《述野田氏赣江流域之调查报告》、《述野田氏袁江流域之调查报告》二文,记述内容的章节分类与前引大庾岭一文基本相同,皆由张与权翻译。综其所述,大致可知野田1915年1月8日前在闽西地区调查,1月8日由江西瑞金开始,先后经会昌、赣县、万安、泰和、吉水、新淦等县,到达南昌,前后18天,行程“千二百四十五里”。又从1月31日开始,由九江到南昌,到樟树镇,到新喻,到分宜,到袁州(今宜春),到萍乡,再到湖南醴陵,共计22天,“里程约二千余”。根据野田的记述判断,他应是现知民初以来在江西境内以科学手段综合考察地理环境、地质地貌、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的第一人,而且也可能是最早按比例绘制大庾岭与赣江流域地质图的人。然而关于他本人的履历及后来的情况,一直未见记载。近十多年来,我曾多次拜托在日本留学或访问的朋友代为查找,皆无发现,留下一段悬案。

2003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深造的杨勇博士将日文版《支那省别全志·江西省》卷复印寄来,并且还综合了上海苏智良、日本薄井由等学者的有关研究,对清末民初由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的中国内地大型旅行调查作了介绍,以利于我们加深对这部《全志》的背景了解。东亚同文书院最初是1900年5月由日本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磨)在中国南京设立的学校,当时称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受义和团运动影响迁至上海,1901年8月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直到1945年关闭。从第一期开始,书院就要求学生在最后一学年里,拿着中国政府的许可证,身带牙粉、仁丹和味精,以两个月或半年时间,到中国各地或东南亚去旅行调查。学生们还多方设法,拿到四川、云